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5.023

## ■ 文学研究

# 论乔治·艾略特晚期作品中的伦理主题<sup>①</sup>

廖 晖

(湘潭大学 大学英语教学部,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乔治·艾略特捕捉到了弥漫于19世纪英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多角度探讨了工业化浪潮下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在传统的宗教性超越秩序解体的情况下,如何找到新的现实秩序的支撑,从而摆脱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解决现代性道德文化危机是乔治·艾略特追问的问题。作者提倡通过扩大人类同情心和“尽义务”来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个人及社会道德进步,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乔治·艾略特;情感结构;《罗慕拉》;《米德尔玛契》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5-0138-06

## On Morality in George Eliot's Later Works

LIAO Hui

(English Teaching Department,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George Eliot paints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pervading the 19th century England. George Eliot probes into the assaults on human society with the changes in values in respons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Eliot concerns is how to maintain the real order when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faith fades away, so as to provide resolutions to the modernity moral crisis by fighting against the moral relativism and nihilism. Eliot advocates the promotion of both personal and social morality by means of the extension of sympathy and the fulfillment of duty, so as to develop a high degree of rapport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Key words:** George Eliot; structure of feeling; *Romola*; *Middlemarch*

19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坛,群星璀璨,文才辈出,乔治·艾略特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其作品广阔观察视野、充沛的情感内涵和深邃的哲学思辨使其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研究重点。在艾略特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弗吉尼亚·伍尔夫撰专文盛赞她是“女性的骄傲和典范”<sup>[1]102</sup>。英国文学评论的权威学者F·R·利维斯在他的权威性著作《伟大的传统》中,将其排进构成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三位大作家之列,指出她具有“托尔斯泰式”的高度。然而评论界对乔治·艾略特早期作品着墨较多,她的晚期作品还未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sup>①</sup>。本文从文化研究<sup>②</sup>的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对乔治·艾

① 收稿日期:2013-12-11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A421)

作者简介:廖晖(1980-),女,湖南娄底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在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乔治·艾略特先后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集《教会生活场景》(1857)和《亚当·比德》(1859)、《弗洛勒斯河上的磨坊》(1860)、《织工马南》(1861)、《罗慕拉》(1862-1863)、《菲利克斯·霍尔特》(1866)、《米德尔玛契》(1871-1872)、《丹尼尔·德隆达》(1874-1876)等七部长篇小说。J·W·克劳斯(Cross)在他所著的《英国小说的发展》中,把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创作分为早期和晚期,《罗慕拉》是乔治·艾略特早、晚期作品的分水岭。参见 Cross J 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20:243-244。

② 文化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主张引入文学以外的文化分析因素,关注文学和文化以及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互动联系。

略特晚期主要作品《罗慕拉》(1862-1863)和《米德尔玛契》(1871-1872)的解读来折射作家文学生产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作为一个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关怀的作家,乔治·艾略特捕捉到了弥漫于19世纪英国社会的情感结构——“一种对狂奔逐猎般的‘进步’速度的疑虑,一种对豪气冲天的‘进步’话语的反感,一种对‘进步’所需沉重代价的担忧”<sup>[2]13</sup>。她从多角度探讨了工业化浪潮下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体现了作者对传统道德思想岌岌可危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层出不穷的维多利亚时代处于精神迷惘与困顿中的个人与社会的关注,以及通过扩大人类同情心和“尽义务”来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道德进步,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发展,而且个人的全部禀赋或潜力都能和谐发展”的理想世界<sup>[3]12</sup>。

## 一 “进步”学说,道德困境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具有“转型”的显著特点,霍顿(Walter E. Houghton)指出:“这一时代唯一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点是一种共识,即‘我们生活在转型时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1831年发现,社会转型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人类进步得太快,以至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了废弃,可是人类又还没来得及掌握新体制和新学说。’”<sup>[4]1</sup>的确,工业革命、殖民扩张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为英国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到了1870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在其他国家之上:它的工业生产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铁和煤的产量占世界的二分之一,贸易总额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而且,英国商船的吨位高居各国首位。伦敦成为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sup>[2]6</sup>工业革命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崛起,社会上流行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边沁、穆勒等人的“进步哲学”。边沁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简单地归结为公平竞争和市场供求关系,并认为“整个社会可以通过一组跟经济学原则相类似的、不言而喻的原则来管理”<sup>[5]491</sup>,穆勒则宣称“幸福……是唯一可以被描述为目的的东西”<sup>[6]327</sup>。这些所谓的“科学理论”引导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这种物质层面的极速追求是以精神层面的巨大牺牲作为代价的。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英国社会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神圣理性和人道主义原则产生了怀疑,人们无法从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传统道德中找到精神指引,人人都在理智而又疯狂地追逐着物质利益,“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sup>[7]254</sup>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物欲,人们不惜割舍生活中许多宝贵的东西,如道德关怀、审美情趣甚至亲情和友情,这无疑会导致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作为一个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关怀的作家,乔治·艾略特捕捉到了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结构的冲击,揭示了在商业价值观侵入人类精神领域引发的社会危机中人类精神世界的困惑与迷惘。

《罗慕拉》中的蒂托是一个深受工具理性毒害的典型人物。在他的世界观里,生活的目的就是取得最大限度的快乐,而“任何要求人抛弃为使生命变得甜蜜所必须的好东西的格言,不过是人类隐秘的自私心理的大暴露而已;那是那些想叫别人牺牲以满足自己的人想出来的”<sup>[8]134</sup>。这种以感性和感觉为主导,将道德上的善恶价值归结为感觉上的快乐和痛苦的处世原则必然导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消解。蒂托身处的15世纪的佛罗伦萨面临教会腐败、政府昏庸的危机。在蒂托看来,在这场革命和党派斗争的赌博中蕴藏着无限机遇,“只要聪明机智,能够摆脱掉一切陈旧的信念,准是能看得到飞黄腾达的道路的。”<sup>[8]358</sup>他幻想着在各大党派团体之间充当多面密探来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为了追求个人幸福,他先后背叛了他的养父、岳父、妻子甚至是情妇苔莎。一系列的背叛行为表明蒂托逐渐深陷个人主义的泥潭,割断自己与过去的联系,丧失自我,成为一个非我的存在。他的道德虚无主义和利己主义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他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作出四个规定:即劳动者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者和人的类本质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其中,人同人相异化即指人同自身相对立,人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成了非人,从而也与他人相对立。弗洛姆从心理层面剖析了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他指出,“这种待价而沽的异化人格必定丧失了许多尊严感,而尊严感正是人类所特有的,甚至存在于绝大多数原始文化中。这样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感,不再感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实体。自我感源于这样的自我经验:我是我的经验、我的思维、我的感情、我的决定、我的判断、以及我的行动的主体。自我感先行认定,我的经验属于我自己,而不是某种远离我的东西。物没有自我,而成了物的人也没有自我。”<sup>[9]117</sup>蒂托汲汲追求物质利益,最终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我,就像一个洋葱头,一层层裹在一起,却没有一个核心。事实上,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无厌的贪欲不仅仅是蒂托个人的价值取向,也是处于社会动荡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佛罗伦萨面临的道德危机。“现金联结”(Cash Nexus)已成为当时社会人际交往中的主导模式。政党之间互相倾轧,分割利益,以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终极价值取向。尽管小说描绘的是15世纪的意大利,但作者影射的却是19世纪的英国社会。“小说的主旨并非简单地对蒂托的是非善恶做出道德判断,而是通过对蒂托的毁灭原因的揭示来体现一种道德关怀,发出对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的社会主流话语的诘问。”<sup>[10]</sup>《罗慕拉》不仅凝结着乔治·艾略特对工业化浪潮冲击下人性与社会的深切忧虑和深刻反思,也折射出她对人类命运和道德理想的不懈探索与追求。

《米德尔马契》中的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是工业革命浪潮中功利主义哲学的受害者。当时的米德尔马契镇正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仍在当地拥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如乡间士绅詹姆士·彻泰姆爵士和布鲁克先生都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影响力已经日趋明显,如当地最有权势的人物文西市长和全市最富有的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都是靠经商起家,而当地铺设铁轨的测量已经开始,而“在19世纪,铁路/火车是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最贴切的象征——工业革命伴随着一种对速度的病态的追求,而铁路的兴起标志着科技发展的速度达到了历史新高”<sup>[3]218</sup>。作者展现出新旧时代交替下英国社会的一个断面,交织着各色人物的幻灭故事。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耀眼的光环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他早年曾私吞了应属于威尔·拉迪斯拉夫的遗产,后迁入米德尔马契镇,成了声名显赫的银行家。他用财富和“慈善”赢得了当地人的心,大家都依赖他,怕他,也感激他。他的权力不仅由于他掌握着当地大部分商人的信用命脉,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既慷慨又严厉的慈善家”,“随时准备解囊相助”,也“随时严密监视着慈善活动的后果”<sup>[11]185</sup>。自私的欲望在他身上与教规融为一体,披上了庄严的道袍,使他幻想着通过充当为上帝服务的忠实工具来赎罪,而不必承受应有的惩罚。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布尔斯特罗德的祖辈从未在当地有过任何田产,他的身份和财产来历不明,当地人却并不在乎,他们“往往只是急于考虑,怎样才能使一位新交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至于生活怎样才能使他成为今天这种可资利用的人,则并不想多加过问”<sup>[11]184</sup>。弗洛姆指出,个人的健康与否,根本上讲,还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塑造了人的性格,人的本性反过来也造就了人生存的社会条件。“健康的社会能促进人的如下能力:爱他的同胞,创造性地工作,发展他的理性和客观性,获得自我感,自我感的基础是对自己的创造性力量的体验。”<sup>[9]58</sup>社会性格的异化必然导致个体性格的异化,以意识形态异化为特征的社会很难让人有完整的自我,自我价值不能得以实现,心理结构出现变异,人格趋于分裂。布尔斯特罗德靠罪恶行径发家,他的生命价值和物质利益融为一体,个人的欲望和权力无限膨胀。权力一旦进入那个微妙的领域,就会自行繁殖,大大超出它的外在财产所拥有的实力。布尔斯特罗德考虑的是“要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权力,用它来为上帝增添荣耀”<sup>[11]186</sup>。当曾经的帮凶拉夫尔斯突然现身米德尔马契时,他祈祷上帝让自己摆脱这个唯一的知情人,“但愿上帝的旨意是让那个可

恨的人死去”，“那么他一定要比以往更加虔诚，把整个生命呈献给上帝”<sup>[11]821</sup>。丑恶的欲望甚至促使他借他人之手谋杀了“那个可恨的人”。然而最终他的丑闻败露，名誉扫地，他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屈服，“尽管他一向以卫道士的姿态出现，现在上帝抛弃了他，暴露了他的真面目”<sup>[11]855</sup>。事实上，从当年私吞他人财产开始，布尔斯特罗德就已经逐渐失去自我，他完全陶醉于“金融家”、“慈善家”的巨大的虚幻的光环里，他企图“通过获得一种第二位的自我感来拯救自己”，这种“自我感”来自于他人对他的伟大成就的认同，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的成功感、有价值感。“异化了的人缺乏自我感，只是从自己对他人的期望的回应中体验到自己的存在。”<sup>[9]160</sup>然而当这种外在的认同感崩塌之际，布尔斯特罗德面对的是被遗弃、被孤立的结局。

弗洛姆指出：“19世纪的社会性格基本上是竞争、囤积、剥削、崇拜权威、攻击性、个人主义。”<sup>[9]80</sup>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导致人的畸形发展和他与周围人的畸形关系。这类物化的人物形象在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从《亚当·比德》中因爱慕虚荣与地主少爷亚瑟私会，并被后者始乱终弃的海蒂，《织工马南传》中因贪图财富而抛妻弃女的地主少爷高德弗雷，到《激进党人菲利克斯·霍尔特》中为“成为北罗姆郡的一个有分量的人物”而不择手段的“内心空虚的政治投机分子”哈罗德·特兰姆森，物质至上的“机械主义”思想不仅统治了这些人的外部世界，也侵袭着他们的内部世界，正如卡莱尔指出的：“不光人的手变得机械了，而且连人的脑袋和心灵都变得机械了。”<sup>[12]101</sup>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感到痛苦和缺乏人的尊严，人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人性受到了极度的压抑，而所有的这些导致人坠入异化的深渊。

## 二 珍视传统,重建道德

19世纪英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急剧转型造成了个人和社会的畸形发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严重脱节、失衡，新旧世界的断裂引发了深深的文化焦虑。以阿诺德、卡莱尔、罗斯金等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家从文化层面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或和谐性遭受侵蚀的问题。卡莱尔指出，“人的这两类活动（笔者按：指人的内心活动和人的外部世界的活动）互相作用、互相依赖，其联系错综复杂，难解难分，……我们只有使这两类活动协调无误，使两者都生机勃勃，才能找到正确的行动路线。”<sup>[3]34</sup>乔治·艾略特深受卡莱尔影响，“乔治·艾略特试图指明社会发展应该是渐进而延续的。这种逐渐的发展体现了她的信念，即变化绝不能发生得太突然，否则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是有机的、长久的；她还相信……必须让心灵的变化领先于观念的变化，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变化。”<sup>[13]39</sup>事实上，乔治·艾略特终其一生都在作品中试图构建一种统一和谐的社会道德秩序。她早期的小说大都描述了英国中部地区乡村小镇的人们面临的情感与道德冲突，通过描写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制约关系，她强调了个人对集体和他人的服从，以及通过激发道德力量和人本关怀实现社会道德进步的必要性。其早期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经历了心理和道德上的发展和成长，实现了由自我中心主义到获得完整的自我意识的道德进步。在晚期的主要作品中，乔治·艾略特将道德的自我完善的主题置于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下，以辛辣嘲讽的笔调抨击了盛行于19世纪英国社会的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揭示了工业革命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失落感，一种失去原有的、已知的社会群体的感受。同时，她着力刻画和塑造一系列勤劳、善良、质朴的人物形象，推崇和弘扬“人本宗教”的道德理想，试图为商业价值观侵袭下的维多利亚社会开出一剂救世良方。

《米德尔玛契》中最感人的情节莫过于布尔斯特罗德夫人在得知丈夫的丑闻曝光后的表现，她觉得自己与丈夫共享了半辈子的荣华富贵，现在惩罚降临到他的身上，她没有理由抛弃他。“她摘下了所有的首饰，穿上了朴素的黑外衣”<sup>[11]881</sup>，决心和丈夫携手面对一切耻辱和孤独，“她坐在他的身边，跟他一起啼哭。……他的忏悔是无声的，她的忠诚的保证是无声的”<sup>[11]881</sup>。而遭受婚姻失败打击的多萝西娅

将视野从她和卡苏朋的小世界向外延伸,看到在她狭隘的自我以外还有一个不受主观思维决定的更大世界。她抛弃观念式的宗教教条,代之以一种对人生直觉的、质朴的理解。她变得愈加善良和富有同情心,无私地帮助身陷困境中的人们,她认识到,“只要有追求至善的愿望,就算我们不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又不能做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我们仍是反对恶势力的神圣力量的一部分,因为这将扩大光明的范围,缩小黑暗的区域。”<sup>[11]467</sup>在利德盖特深受债务和社会舆论重重压力的情况下,多萝西娅慷慨解囊帮助其缓解债务危机,同时劝慰罗莎蒙德支持理解丈夫利德盖特。在艾略特看来,在充满幻灭与挫败的世界里,是人与人之间“纯洁而自然的关系”医治心灵创伤。人只有在同类之中,才能找到爱并体悟到人生的意义。这种个体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正是艾略特反复提倡的情感道德之一。她指出,“我们的尊严和正义感源于我们与某个伟大、可敬、值得为之牺牲、为之自制自律的集体的联系,这远比满足个人的安逸和富足更高尚。”<sup>[14]266</sup>这正契合了阿诺德的社会理想,“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整体中的成员,生长在人类本性中的同情心不会让社会中的一员对其余成员冷漠不顾,或独享追寻完美所带来的幸福”<sup>[15]72</sup>。

《罗慕拉》中的蒂托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而背叛了所有的人,割断了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纽带,最终背负着道德堕落的耻辱,走向毁灭。在乔治·艾略特看来,“无论是有意意识的意志行为还是一时冲动所产生的偶然行为,如果不能与自己的过去保持连续性,它就是不真实的。”<sup>[16]100</sup>而女主人公罗慕拉在认清丈夫蒂托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和极端利己主义者的本质,以及揭穿修道院院长异化曲解宗教道德,借以宗教之名排斥打击政治异己的双重打击下曾陷入极度迷惘状态之中。她远离故土,流落荒岛,后来救助荒岛上遭受瘟疫的村民的经历使她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回到家乡,她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实施宗教道德的行动上,扶贫救弱,舍弃尘世的安逸,过着修女式的行善生活,并无怨无悔地承担起照顾被丈夫抛弃的养父巴尔达萨雷和情人苔莎及他们的孩子的重任。对于乔治·艾略特来说,这种对记忆和情感的虔诚是认识人的本性的关键,因为“我们不留念那些古老而陈旧的事物,我们的爱和生命中崇高的情感不根植于过去的话,谁知道那些所谓的追求会把我们引向哪”<sup>[17]598</sup>。一个企图割断与过去或自身历史的联系的人不可能有健康和安全的生存感。《亚当·比德》中好逸恶劳的海蒂急于摆脱对她恩重如山的波伊赛夫妇和深爱她的贝德,最后落得流放出境的下场。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主人公麦琪坚决抵制住了与表妹的情人斯蒂芬私奔的巨大诱惑,因为她“不能忘掉过去而重新开始一种新生活”,她“一定得回忆过去、留念过去”<sup>[17]601</sup>。正是对记忆的虔诚使人保持自我的连续性,珍视个体与集体的联系,从而摆脱个人主义的窠臼,实现道德的完善和生命的和谐,这也是人类文明得以传承的基础。

乔治·艾略特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工业化的理性时代,工业文明对宗法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自然和谐的关系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从《罗慕拉》到《激进党人菲利克斯·霍尔特》,乔治·艾略特深入维多利亚时代繁荣稳定的社会表象背后,向读者揭开了一幅幅社会政治矛盾此起彼伏、思想文化危机日益激化的英国社会图景。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人在享受物质繁荣的同时也承受着文化心态上的失衡和失去信仰后的孤独。在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艾略特始终在探索人的天性和社会道德问题,她努力挖掘人类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唤醒人类的同情心。她倡导人们努力“尽义务”,“在人生的艰难困苦之中,人们应该互相帮助。人们彼此之间的帮助给人生增添了生气和意义”<sup>[18]36</sup>。正是成千上万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默默无闻的善行,使人们摆脱道德的愚昧,使世界和人生充满价值和意义。

### 三 结 语

19世纪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一方面,科技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对传统的宗教道德产生了动摇;另一方面,以边沁、穆勒等人为代表的“趋利避害”的利己主义、功利精神泛滥。维多利亚人“徘徊在两个

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无力诞生”<sup>[19]288</sup>。如何在传统的宗教性超越秩序解体的情况下,找到新的现实秩序的支撑,从而反对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解决现代性道德文化危机是乔治·艾略特追问的问题。乔治·艾略特的晚期作品聚焦于转型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关注工业化时代英国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质量的改变。她笔下的主人公或在面对考验和诱惑时感到迷惘并在堕落中毁灭;或则在迷惘中顿悟、觉醒,从而摆脱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泥潭,并重新认识人生与自我。作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主人公们在选择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时所经历的种种彷徨和痛苦,以及深深的焦虑和不安,影射出19世纪英国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作者发出对工业革命过程中以新面目出现的一连串社会价值观的质疑和诘问,以及一种对人类社会进程以及文明建设速度的深切忧虑。艾略特希望以“爱的宗教”密切人际关系,消除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不和谐,甚至用它解决英国社会由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她在作品中努力构建和谐、道德的理想社会模式,提倡自我奉献的个人道德,呼吁同情、友爱的社会道德氛围,以“尽义务”的思想增强社会凝聚力、建立新的道德生活,展现了“人本宗教”的道德思想,这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社会生存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 伍尔夫. 伍尔夫散文[M]. 刘炳善,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 [2] 殷企平. 推敲进步话语: 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3] 殷企平. “文化辩护书”: 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 [4] Walter E, Houghton.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 - 1870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 [5] Kenneth O, Morgan.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6] Raymond Williams. Key Words[M]. London: Fontana Press,1976.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 乔治·艾略特. 罗慕拉[M]. 王央乐,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9] 艾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孙恺祥,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10] 廖 晖. 认同危机下的自我异化——论《罗慕拉》的异化主题[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2):101 - 104.
- [11] 乔治·艾略特. 米德尔马契[M]. 项星耀,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12] Thomas Carlyle. Signs of the Times[C]//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omas Carlyle(Vol. 3).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58.
- [13] Barbara Hardy. The Novels of George Eliot: A Study in Form[M]. Bristle:Western Printing Services LTD,1959.
- [14] Karl R, Frederick. George Eliot: Voice of a Century[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 [15]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C]// Samuel Lipman. Ann Arbor. Michigan: Yale University,1994.
- [16] Newton K M. George Eliot: Romantic Humanist[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4.
- [17] 乔治·艾略特.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 祝庆英,郑淑贞,方乐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18] George R Creeger. George Elio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M].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1970.
- [19] Matthew Arnold. Stanza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C]// Kenneth Allott. 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 London: Longmans,1965.

(责任校对 朱正余)